

舍利是諸相空

東海大師無相傳研究

冉雲華

(續完)

玄宗的另一項禁斷妖惑的詔令，頒發在開元十九年（731）。這項詔令說：「自今已後，僧尼除講律以外，一切禁斷。六時禮懺，須依律儀。午夜不行，宜守俗制。如有犯者，先斷還俗，仍依法科罪，所在州縣，不能捉報，並官吏輒與往還，各量事科貶。」³⁸

敦煌卷子歷代法寶記所描繪的無相傳法儀式，正巧和上述的禁令抵觸。第一、「金和上每年十二月正月，與四象百千萬人受緣」³⁹。可見他的信徒是衆多的。第二、宗密的記載，不但證明無相法會中人數衆多，並且傳法的時間多在深夜：「召集僧尼士女，置方等道場禮懺，或三七、五七，然後受法了，皆是夜間。意在絕外，屏喧亂也」⁴⁰。這種深夜聚眾，屏外的神秘傳法儀式，很可能會招惹官府的懷疑。在兩京失陷，變亂四起，皇帝逃亡，百官失散的情形下，作爲負責行都地方官的縣令，自然會加強治安的。何況無相還和吐蕃王子有過來往。

從比較社會學上着眼，無相的傳法儀式和教義，多少反映新羅和唐帝國社會的不同。當時的中國宮庭佛教，是以典籍、哲理、和禮懺而出名的。新羅當時社會更接近部落社會，佛教內容着重實踐，無相的教學，是「無憶、無念、莫忘」這三句話。與無相有關的敦煌卷子，也只是些簡短法語和一首短偈而已。他的法語使人想起另一位留唐的新羅學者崔致遠，所引用的一句佛經名言：「受持萬偈，不如一句」⁴¹。

以社會身份而論，韓國學者多認爲新羅佛教與皇室關係密切。在新羅統一高句麗和百濟以後，當地僧侶的貴族化，發展得更爲快速⁴²。與新羅的情形相反，唐代的佛法雖盛，但一般僧人的地位，仍然不能和名門世族、達官貴人相比。作爲貴族的新羅僧人，可以自由的選擇儀式，弘法傳教，不受阻礙；作爲平民性的唐代地方僧人，還得遵守政府的法令。無相和成都縣令的衝突，給比較社會學保留下一份史料。

神通廣大 名傳吐蕃

無相和成都縣令的交涉和勝利，使他在益州的聲譽大增。宋高僧傳記載說，那位失敗的縣令楊翌，懾於無相的神通，馬上從一位反佛的官員，轉變成一名熱心的佛教信徒，他於是「奉送舊所，由是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菩提、寧國等寺，外邑蘭若、鐘塔不可悉數。先居淨衆本院，後號松溪是歟！」⁴³。

除開他在拒捕時所顯的那一手神通以外，宋高僧傳和明代編修的神僧傳內，還記載着無相的神通力：像他早期在深山坐禪時

，長期不食煙火，數遇猛獸，都能不爲所動，免於傷害；又如他曾冥知有刺客來行刺，乃至預言會昌（845）毀佛的大事等⁴⁴。這位新羅禪師的神通，不但名滿川西，績著中國佛史，他的名聲甚至遠播到吐蕃國（西藏）去。自古以來人們總以爲西藏佛教自印度嫡傳，根本沒有想到中國佛教對吐蕃宗教，會有什麼影響。近數十年西方佛教史學家，在研究了藏文資料以後，才發現藏文中保藏了不少的中國佛典，也記載着金和尚的神通⁴⁵。

記載金和尚的藏文史籍，正是被傳爲藏文最早的歷史著作山耶寺紀年（*b Sam - yas - lo - rgyus*）。這部據說是婆腊大臣所撰寫的編年史，雖然不斷爲後代編撰的藏文史籍所引用，但因本子流傳不多，學者們很少讀到原本。直到法國藏文學者 R. A. 斯坦因，把他所得到的手抄本，影印出版，才使各國的學者，看到那本書的全文⁽⁴⁶⁾。不過斯坦因在他的法文提要中，着重於吐蕃歷史上的大事，並沒有對無相的部份有什麼陳述。

後來日本學者山口瑞鳳，撰寫「吐蕃佛教與新羅之金和尚」時，才把藏文有關無相的資料譯爲日文⁽⁴⁷⁾。這才使研究佛教史的學者理解到，無相不但在中國有名，並且也會譽及吐蕃。更重要的是在西藏佛教史中，天竺僧人或西藏喇嘛佔滿每一個時代。中國和尙能被注意到的，已經是屈指可數，新羅僧人能夠享譽西藏的，目前所知只有金和尚一人而已。

藏文史籍對金和尚的記載，是充滿着神秘色彩。話說吐蕃王子一行，在朝覲了大唐皇帝以後，得到千卷紺紙泥金書寫的卷子及其他賞賜，取道西川返回吐蕃。在王子和從臣的歸途中，妖魔作怪推倒山岩，道斷途塞，無法前行。倒下的山岩石大體重，沒有人有力把岩石移走。就是在那種困局下，他們邀請金和尚出山協助。那位高僧牽虎而來，入定三日，大顯神通，岩石自破，妖魔伏降。王子感嘆拜服，請求和尙預言前程，指點迷津。金和尚以他的神通妙力，入定觀察，然後告訴吐蕃王子說：吐蕃當時權臣弄政，佛法凋零。一直要等到王子成年，承繼大統，佛法才會再度復興。王子受教，頂禮而別。返國觀察當時局勢及後來演變，都像金和尚所預言的那麼樣……。

根據山口瑞鳳的推算，吐蕃王子的唐朝之行，當在 754 年前後。正在無相成名之後，玄宗到達成都以前的那一段時間。藏文史料的神話色彩，自然很難令人以常情推斷。何況那本史書的本身，並不是第一手記載。西藏歷史文學的作者在討論山耶寺紀年這部書時，就會指出它會被後世的僧侶、國王和大臣多次加以削改和增補。在那種情形下，想要一睹那本紀年史的原來章節，幾乎是不可能的⁽⁴⁸⁾。儘管如此藏文資料對研究無相傳記仍有相當的

價值。第一，它補充了無相與吐蕃使節來往的一段資料。第二，它證實了宋高僧傳和神僧傳所記的事實，即無相是以神通力而出名的。

逝於川西 枝繁葉茂

無相去世的年代，有兩種說法：其一是歷代法寶記，它說無相於寶應元年（762），五月十九日「夜半子時，儼然坐化」⁽⁴⁹⁾，享年七十九歲。

其二是宋高僧傳。它說無相是「以至德元年（756），建午月十九日，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⁵⁰⁾。從這兩件資料被學者發現以來，有人從此，有人從彼，對無相的逝世日期，還沒有人仔細研究過。如果以甲子推算，宋高僧傳所記顯然是不可靠的，因爲至德元年並沒有「建午」的五月。

倒是 762 年真的有「建午月」。762 年也是荷澤大師去世的一年，荷澤去世的日期，也會夾纏不清，直到胡適晚年，才把那宗案子，考正清理。胡氏所根據的理由，也是「建午月」一詞。他說：「只有肅宗最末一年，那個沒有年號的「元年」（762）才有建午月的名稱」⁽⁵¹⁾。造成那種特殊紀年的原因，是唐肅宗在上元二年（761），「忽然下了一道驚人的諭旨，反對改元，反對年號」⁽⁵²⁾。這麼一來，761 年的後幾個月，和 762 年的前四個月，沒有年號，只好以甲子記月了。胡氏證明「建午月」只有 762 年才有一點，正好和歷代法寶記所記的日期，完全一致。

不過胡氏在討論無相去世月份時，却下錯了結論。他說「無相死在寶應元年四月十九日，就是那個沒有年號的「元年建巳月十九日」」⁽⁵³⁾。歷代法寶記和宋高僧傳都一致記載無相是死在「五月」或「建午月十九日」。胡適把「建午」改爲「建巳」的理由，是那年五月——即「建午」月頒佈了新的年號「寶應」，以所有應改稱元年五月，不應再繼續叫「建午」月了。其實中國古代交通不便，朝廷決定的正朔，總要有一段時間，政令才能下達，付諸實行。何況古今文人有的歡喜以甲子繫年，即是在一九七八年的今日，不是仍有畫家、書家，一樣的在寫戊午年嗎？

歷代法寶記在記載無相去世年代一點，雖然正確，但這並不表示它在各方面都比宋高僧傳更好。事實上這兩部書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的。前者的長處是它編撰於第八世紀，上距無相生日未遠，對無相的生平沒有作神話性的誇張。它的缺點是作者宗派色彩濃厚——以一半以上的篇幅，詳述無住（714—774）保唐寺一派的禪法；並且把那一派形容為無相的唯一嫡傳正統。宋高僧傳的缺點是距離無相在世的日期，已有兩百多年，所用的史料不免有傳抄訛誤的可能。無相去世期日的混亂，足以說明那種現象。另一方面，它所引用的資料却比較豐富完全，例如它會參考了資州刺史韓法和李商隱所撰寫的兩篇碑文⁶⁴。韓法在兩唐書中雖然沒有傳記，但是名列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內。韓家是唐代的望族之一，水字旁的一代，頗多名人，除開韓法以外，還有韓滉、韓澣等人⁶⁵。

無住到底是不是像歷代法寶記所說那樣——是無相派禪法的唯一嫡傳？在這一點上，原籍四川的佛學思想家宗密，清楚告訴讀者，無住的保唐派和無相的淨衆派，無論是在哲學見解，或是宗教實踐上，都有不同。宗密寫道：「復有保唐宗，所解似同，所修全異」⁶⁶。從兩人師承系統上觀察，宗密在另一本書中指出，無住先跟一位俗家師父陳楚章（又稱陳七哥）學習禪法。因為陳是白衣俗人，無住深覺傳法不便，所以決定另尋出路的⁶⁷。後來他遊化到益州地方遇見無相，「遂認金和尚爲師」。雖然如此，宗密馬上指出：無住「指示注意大同；其傳授儀式，與金門下全異」⁶⁸。就是在示法上，無住雖然「亦傳金和尚三句言，但改忘爲妄，于諸同學錯預先師言旨」⁶⁹。歷代法寶記證實了宗密所起的無住歷史，和他與無相不同的地方⁷⁰。

宋高僧傳把淨衆寺稱作爲無相的（本院）⁷¹。就表示說淨衆宗才是無相的嫡系禪法。這一記載和宗密的記述，完全一致。可是歷代三寶記對淨衆派只是一味攻擊，好像那一邊全無人材，全些不解師意，只想佔廟業的「小師」⁷²。

宋高僧傳還記錄說，無相嫡傳的弟子是淨衆寺的神會（720—794）。這位祖籍中亞細亞，俗姓石氏的和尚，大約在750年左

右，「入蜀謁無相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印。無相歎曰：吾道今在汝矣！」⁷³無住是在759年才遇到無相的。他比神會投師的年代，晚了近十年光景；而且和老師相聚的日子也比神會短。雖然歷代三寶記連神會的名字都沒有提一下，但是這並不足表示神會實無其人，也不能抹殺他的成就。事實上到了第九、十世紀時，神會一派的淨衆禪法，仍是枝繁葉茂，受人尊敬。宋高僧傳形容說：「初會傳法在坤維、四遠禪徒、臻萃於寺……禪門榮之」⁷⁴。和此相反，無住創立保唐寺一派禪法，却沒有人被記入宋高僧傳，可能是這一派流傳得並不長久。

其他資料 亦有價值

宗密還記載說，無相另有一名弟子，江西道一（709—788），他是中國禪宗巨匠，創立洪州一派的禪法，對禪宗後來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宗密在他記敘禪門七家時，列無相的淨衆宗第二，無住的保唐宗第三，道一的洪州宗第四。道一與無相禪法的不同，是非常清楚的。不過宗密注意到，道一在他的早期求法尋師時代，曾屬智詵——處寂——金和尚這一派門下：「因有劍南沙門道一，俗姓馬，是金和尚弟子……」⁷⁵宋高僧傳則說馬祖「削髮於資州唐和上……」⁷⁶，後代禪宗歷史景德傳燈錄等也有類似的記載⁷⁷。嚴耕望對這一混亂記載，作過這樣的解釋：「或者先師唐和尚，及唐和尚示寂，無相繼位住持靜衆寺，馬祖即師事之，此在當時爲普通現象，不足異也。按後世言禪宗者，推馬祖一系最盛，今論其師承所自，亦本出於無相……」⁷⁸。

雖然道一早期，曾屬唐和尚——金和尚這一系統，但是他和這一系的師承關係，仍然十分模糊。按唐和尚（處寂）死在734或736年；懷讓死在744年，道一離開四川以後，「久住荆南明月山，後因巡禮聖蹟，至讓和尚處，論量宗運，徵難至理。理不及讓，又知傳衣付法，曹溪爲嫡」⁷⁹。另一方面，無相大約在730—734或736年間，住在處寂的德純寺，後來到天谷山去參禪。就是在「金和尚得付法及信衣，遂居天谷山石巖下……後章仇大夫請開禪法。居淨衆寺，化度衆生，經二十餘年」⁸⁰。看來

無相在得法之後，似乎再沒有返回資州德純寺去「繼位」，淨衆寺是無相創建的，與唐和尚無關。

上述的史料說明，道一與無相如有接觸，很可能是在資州同事唐和尚的那兩年。他和懷讓的相聚，最遲當在 743 年。他在明月山既稱「久住」，總有兩三年的時間，無相在益州的成名建寺，大約在 740—42 年間。在這樣的情形下，道一和無相相聚的時間，不會太長，且有可能根本沒有到過淨衆寺。即是 he 真的聽過無相的開示，道一恐怕並沒有得到多少益處，否則他不會離開四川，更不會改事懷讓。這些事實表示說江西禪法是出於無相的說法，還值得商榷。

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的卷子，斯 6077 號題作無相五更轉。這是一首短偈，因為題名寫爲無相，很可能是傳爲無相所作的唯一完整作品。敦煌卷子中的五更轉有多種，傳爲無相的這一份是其中的一個。巴甫博士曾把這首短偈，收入他編著的敦煌韻文集中⁽⁷¹⁾。但如想考察這首短偈與無相一派禪法的關係，還得留待來日，另文討論。

一九七八、三、修正稿於加拿大漢彌敦市

——原載「敦煌學第四輯」

註文而用書籍路號：

唐大詔令集（1959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第 558 頁。

記，第 143 頁。

疏，第 278 頁丙欄。

引自崔文「新羅迦耶山海印寺善安住院壁記」，東文選（漢城，慶熙出版社，1976 年影印本），第 283 頁上。

見 Buddhist Culture in Korea（漢城，1974），第 123 頁。

傳，第 832 頁^[2]。

同上。並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卷，第 999 頁中至^[3]。

在這一方面，主要的作品有戴密微著 Le concile de Lhasa（Paris, 1952）；杜籍著（G. Tucci）：Minor Buddhist Texts，第一冊，（Rome, 1958）。吳其昱博士，會將戴書節譯，刊於敦煌學第一期。

R. A. Stein, Une chronique de bSam-yas (Paris, 1961)。

收在金知見、蔡印幻編新羅佛教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昭和四十八年版）一書中。

(46) 參閱 A. I. Vostrivko 著 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被收入 Indian Studies: Past & Present (Calcutta, India)，第十一卷（1969-70），第 241 頁。

記，第 143 頁。

傳，第 832 頁^[4]。

神會和尚遺集，第 732 頁。

同上。

同上書第 737 頁。

傳，第 832 中至 833 頁上。

新唐書，卷七十三，第 12 頁上。
引自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鎌田茂雄編、校，分段、標點，中日對照本，禪の語錄 9：禪源諸詮集都序（東京，筑摩書房，昭和 46 年），第 298 頁。

疏：第 278 頁丁欄。

同上。

記，第 168，200 頁等。

傳，第 832 頁丁欄。

記，第 198 頁等。

傳，第 764 頁上。

疏，第 279 頁甲。

傳，第十卷，第 766 頁上。

景德傳燈錄，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一卷，第六卷，第 245 頁下。
見上引唐代史研究叢稿，第 458 頁。

疏，第 279 頁甲。

記，第一四二頁。

見原書（台灣，高雄，1965 年排印本）第 50-51 頁。作者曾在上述英文稿中（見上註⁽¹⁾），把這份短偈譯成英文。

雲華按：斯 6077 號卷子殘破，在「無相五更傳」本文後面，還有殘文兩行：「無相偈五首」。可惜留下的字句，殘缺太多，無法成文。雖然如此，這份卷子仍然告訴我們，在敦煌卷子的禪偈中，起碼有兩件是傳爲無相所著的。